

# 辜顯榮的多重身份認同

• 何彩滿

辜顯榮1895年聽聞日本軍隊即將開進基隆，於是前往擔任嚮導迎接日軍進城。他協助日軍平定台灣秩序，因此獲得日本殖民政府給予諸多經濟權利，此乃辜家興起並躍升為台灣五大家族之關鍵。

辜顯榮是誰？其子辜振甫，前海基會董事長，雖說毫無政府官職，卻代表台灣政府與大陸海協會參加了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重新開展中斷了四十多年的兩岸關係。辜振甫受派為海基會董事長之前，曾經破例前往台灣立法院備詢，遭受當時任立法委員的陳水扁質疑其為「賣台家族」。「賣台」污名起因於辜顯榮。在歷史評價方面，他是個具爭議性的人物。

辜顯榮1866年出生於台灣的彰化鹿港。1895年，他聽聞日本軍隊即將開進基隆，於是前往擔任嚮導迎接日軍進城。這是他一生爭議的開端。他協助日軍平定台灣秩序，因此獲得日本殖民政府給予諸多經濟權利，如樟腦、食鹽專賣、鴉片特許等等，此乃辜家興起並躍升為台灣五大家族之關鍵。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截至辜顯榮

去世之前，皇族共二十七次訪問台灣，每一次辜顯榮都單獨獲皇族召見。對中國外交方面，辜顯榮多次穿梭中日之間，會見了蔣介石、馮玉祥、汪精衛等要人，甚至於1933年在福建發生的閩變，他居中斡旋，有功於蔣介石的擊潰叛軍行動。1934年是辜顯榮人生的巔峰，作為台灣人，他是第一個被敕選的日本貴族院議員。他第一次參加的帝國議會，座位被安排在面對天皇的席位<sup>①</sup>。1937年，他於東京去世，天皇以特旨，敘從五位。

富甲一方，且向殖民政府權力核心靠攏的辜顯榮，被描述為「御用紳士」<sup>②</sup>，他的身份認同是甚麼？且先看看同時代的日本人怎麼看他。日人在辜顯榮過世之後為他編纂的傳記裏，對他的形容是：「辜顯榮一生義勇奉公，充滿日本精神，可謂眾目昭

\* 本文接受大學研究資助局 (HKU 7468/05H) 的資助，屬於“Entrepreneurial Families: The Rong, Gu and Ho Tung Business Dynasties”研究項目的部分成果，謹此致謝。本文初稿曾在2008年6月28日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周末公開講座」中發表，作者感謝主辦單位的協助及與會人士的意見。

彰。」台北州警務部長如此形容：「辜顯榮是國民精神的鼓吹者，就我所知，他是台灣人中最積極的人。他具有不輸給日本人的日本精神，是如假包換的日本人。」另一敘述稱：「四十年來，他經常感謝皇恩，以一個真正日本人的身份，為國效勞。一旦國家有事，我相信，他一定粉身碎骨，為日本盡力」。友人之一的木下信說他：「努力同化成日本人，並以身作則，在日常起居、家庭用品方面，都表現出日本風味。」<sup>③</sup>

根據報章報導，辜顯榮的葬禮，經過家屬協商討論，決定打破台灣舊有習慣，不延長殯殮。為了給台灣人當示範，一切儀式採日式進行<sup>④</sup>。至此，若僅談論身份認同，本文幾乎可以對於辜顯榮的一生蓋棺論定。顯然地，辜顯榮相當認同日本的統治，他的努力也完全獲得日本人上下一致的肯定。他生為清朝人，死為日本人。

但是，為何日本人要如此強調他「是如假包換的日本人」？如果是天生自然的日本人，根本無須去放大這個身份。這種凸顯，恰巧洩漏了一個事實：理論上已經成為日本人的台灣人，卻不是在經驗上都是日本人。「真正」、「如假包換」，表示要到達那個完美標準之間，還有一段距離。他為何要這樣努力？此外，值得深問的是，為何辜顯榮有非親日不可的動機？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個人如何和自己的民族認同意識妥協<sup>⑤</sup>？

我們永遠無法窺探辜顯榮的內心世界，探詢其真正的身份認同。但是藉着斷簡殘篇，本文嘗試跳脫民族主義與道德的評判，而提出以上的提問，以期揭露個人在殖民認同過程中多重身份的緊張關係。評判辜顯榮是日本人／台灣人／中國人，不是本

文的目的，筆者想處理的是，「日本人」、「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身份是怎樣被認知的？這對個人的「認同」形塑過程起着何種作用？本文有關「認同」這項課題的發問，不光是為了理解辜顯榮個人的轉化而產生，而是藉此重新審視個體生命的存在感與歷史經驗的關聯。

「認同」，涉及一連串「類同」(sameness) 與「差異」(difference) 的建構過程。這段形塑台灣人內心世界的漸進式，與日本殖民策略有着密切關係，而日本不斷調整的殖民方針又跟日本與西方和亞洲的關係變化相連。我們將從歷史因素、他者的對待以及現代化等面向，來討論辜顯榮強化日本人身份認同的社會脈絡，接着探究在日本殖民策略下所帶來的身份矛盾問題。

根據報章報導，辜顯榮的葬禮，經過家屬協商討論，決定打破台灣舊有習慣，不延長殯殮。為了給台灣人當示範，一切儀式採日式進行。至此，若僅談論身份認同，幾乎可以對於辜顯榮的一生蓋棺論定。



辜顯榮像

## 一 把歷史放進來—— 分崩離析的中國

1894年，清廷和日本為爭奪朝鮮半島的控制權爆發了一場戰爭，史稱「甲午戰爭」。1895年4月，中日兩國簽訂《馬關條約》，清廷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

當割台成為不可改變的定局時，台灣的清廷官僚和士紳商賈，苦苦哀求清廷挽回，卻得不到回應。他們於是接受外國商人的建議，認為宣布台灣獨立，或許能夠引起外國干涉，制止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這些事情，不管是由清朝巡撫唐景崧，還是幕僚、官吏所發起，台灣人民均無所知，都由官吏所包辦<sup>⑥</sup>。進士丘逢甲與台北士紳推舉唐景崧為總統，提倡建立民主國，設立議院等機構，以丘逢甲為副總統兼民兵司令官，統領抗拒日本接收。

5月25日民主國成立之後，不到五天，日軍在澳底登陸，岸上的駐軍是唐景崧派人到廣東募來的廣東兵，無專人統帥，結果彼此內鬥，遇到日軍，不戰而潰<sup>⑦</sup>。6月4日，日軍還在基隆，唐景崧就連夜逃跑，不顧一切搭上英輪亞沙號逃回廈門。創立僅十天的民主國就這樣垮台了。唐景崧被戲稱為「十日總統」。此後，台北城內一片混亂，官兵變成強盜，人民生命受到嚴重威脅。日軍眼見台北城內不同省籍的清兵自亂陣腳，放火掠奪，也不敢貿然前進。在動亂中，外國人以及商人最着急。其中，中國商人因為恐懼，想請日本人迅速進城，以求驅逐暴徒，但同時又怕萬一朝廷的官軍勝利，他們又會被視為漢奸而遭到砍頭，也不敢在申請書上簽名。

最終，幾位鄉紳李春生、李秉鈞、劉延玉、辜顯榮，德商代表奧利(Ohly)、英商湯姆森(Thomson)，美國記者戴維森(James W. Davidson)等人商議迎接日軍進城以維持秩序。他們委請艋舺(今日之萬華)「瑞昌成」號店主辜顯榮作代表<sup>⑧</sup>，他帶着一把傘與簡單的「嘆願書」<sup>⑨</sup>，隻身前往基隆。當時任總督府民政局長的水野遵和幾位軍方幹部一起接見辜顯榮。有人懷疑辜顯榮是抗日領導劉永福派來的間諜，有人直指他是土匪，一時之間，辜顯榮情急落淚。最後，水野遵力排眾議，辜顯榮得以保住性命，從此開創另一種人生風景。

日本人進台北後，在城內四處公告：「台灣與澎湖群島永久割讓給日本。」<sup>⑩</sup>按照辜顯榮的說法，倘若日軍進城，無人加以指引，土匪與良民將無從區別，台北城勢成為戰場，無辜之民恐有數千、數萬人被屠殺<sup>⑪</sup>。此時，辜顯榮擔任保良局局長，跟隨着日本皇族北白川宮親王，四處宣傳台灣全島已經成為日本版圖的一部分，島民也皆成為日本帝國的臣民。回到台北後，他發現台北城外，有民眾遭到誅斬，於是他晉見台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記，要求給予權限進行良匪的調查。數百名捕囚因此得到釋放。

除了歷史環境參與認同建構，他者的對待，也影響主體性的形成。日本人如何看待台灣這塊領土？首先是1900年，日本的「四神二座」成為鎮守台灣之神<sup>⑫</sup>。鎮座典禮舉行時，北白川宮大妃親自來台。接着從1901至1935年之間，有更多皇族來台。對日本人而言，皇族的密集訪台，表示了皇室與新歸附之民關係更加堅定，表

辜顯榮帶着「嘆願書」隻身前往基隆。當時任總督府民政局長的水野遵接見他。有人懷疑辜顯榮是抗日領導劉永福派來的間諜，有人直指他是土匪。最後，辜顯榮得以保住性命，從此開創另一種人生風景。

現了日本皇室將台灣與日本一視同仁之美德。

1896年，乃木希典到台灣就任第三任總督，他母親以愛國婦人會台灣分會會長的身份，跟隨到台灣。親朋好友多以台灣流行病肆虐為由加以勸阻，希望老太太不要到台灣，但她卻嚴肅地回答：「為了國家，我準備埋骨於台灣。」被台灣人稱為乃木太夫人的她，因為霍亂，果然死在台灣。1919年，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病逝福岡，遺言要求將其骨灰埋葬在台灣，「願余死後能成為護國之魂，亦或鎮護吾台民」。日本人將台灣視為領土之後，日本的神社與墓園在台灣愈建愈多，也有很多日本家庭將戶籍從日本帶到台灣來。日本人所生的孩子，也視自己為台灣人<sup>⑬</sup>。日本人將台灣視為埋骨之所在，可見台灣在當時的日本人眼中，已成為家鄉了。

1895年間，有一次日本友人中村純九郎拜訪大稻埕的辜家。聊天談話中，中村問起辜顯榮對李鴻章的觀感。辜顯榮憤慨地說：「他是個賣國奸臣，是個賣國賊。」中村認為辜顯榮的回應很特別，按他的想法，在台灣已經歸屬日本領土的情況下，這麼效忠日本的辜顯榮，應該要說李鴻章做得好，辜顯榮卻批評他是個奸臣<sup>⑭</sup>。

在批評李鴻章與認同日本人的統治之間，有否存在矛盾？對辜顯榮而言，兩者並不矛盾。他自知行事為人頗受爭議，也自認「是個問題人物」<sup>⑮</sup>，但是當他知道有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不顧台灣人，盡求自己的榮華富貴，視他為台灣人民的仇敵時，他就對這些指控加以反擊。他認為，只有在政府裏任職的人，才有資格賣國；不論官職大小，若侍奉兩個國家，就

是不忠不義。但若是一般平民，則無須背負此責。他之所以成為日本人，「絕非背叛清國。清國皇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帝國，所以堂堂成為日本帝國之臣民。而既為日本臣民，盡忠於日本帝國，拯救我三百六十萬同胞，是本人微衷」<sup>⑯</sup>。

讓我們將場景拉回到那個時代的台灣。清廷在法理上將台灣割讓出去，李春生用「棄地移民」來形容台灣的命運<sup>⑰</sup>；倉卒成軍的台灣民主國，根本沒有能力護守台灣，遑論總統已先跑了，所召來的官兵已變強盜，此時的民間社會人人自危。辜顯榮在此情況下自請日軍入城，其實承受了很大的風險。往後的事態發展，特別是日軍進城後公布：「台灣島及其附屬之諸島，其全部及永久之主權，從此以後歸屬於日本」<sup>⑱</sup>、皇族訪台、總督埋骨於斯，不僅是一種教育方式，告知台灣人這既成的客觀事實，也試圖拉攏台灣人對日本帝國統治的忠心。

辜顯榮認為，只有在政府裏任職的人，才有資格賣國；不論官職大小，若侍奉兩個國家，就是不忠不義。但若是一般平民，則無須背負此責。他之所以成為日本人，是因為清皇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 二 現代化經驗

另一個強化辜顯榮的親日認同因素，則是來自於台灣現代化的經驗。水野遵局長為了向天皇報告戰後的台灣情勢到了東京，因為協助治台有功，辜顯榮被命令同行，參觀了明治維新後日本工商業發達繁榮的成果。1895年12月2日，辜顯榮第一次到東京。他穿着青衫，還留着辮子。台灣人到日本旅行，這是第一次<sup>⑲</sup>。

### (一) 日本之旅：現代性的展示

我們可以想像，這是辜顯榮的首次「現代性」經驗。儘管無從得知這趟

1895年的日本之旅，是日人向辜顯榮等人展示現代化經驗，也是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提供一種想像。想像一旦落實，將更加強辜顯榮認同日人的統治正當性。不同於過往的在台政權，日人治理台灣是全面現代化的開始。

觀摩帶給辜顯榮何種衝擊，但是比辜顯榮晚些，稍後接受總督樺山資記邀遊日本的李春生，留下了他的日本行觀感。李春生因為富有而被總督府拉攏，他也積極配合。考察日本之旅，因為頗有所感，就在1896年日人創刊的《台灣新報》，連載他遊歷日本的見聞〈東遊六十日隨筆〉長達四個月之久。日本新社會的氣象，令李春生心生嚮往，特別對日本人的子女教育、工作以及日常生活種種均讚美不已<sup>20</sup>。他觀察日本宮內天皇座位的安排，解讀君臣關係：「吾國君臣，之相愛相親，逾於歐西之制，此所以勃焉興也」；並對照中華的君臣關係說：「惜中華有是書之讀，而無是事之行，所以歷代相懲亡也。」<sup>21</sup>1896年，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第二年，寫着「吾國君臣」的李春生在這裏完成了心底裏的國家認同手續<sup>22</sup>。

那麼，辜顯榮的國家認同手續又是如何完成的呢？即使被認為效忠於日本政府，但他的忠誠在初期經常受到懷疑與挑戰。1896年7月，日方獲知將有抗日行動發生，鹿港守備隊長吉弘少校尋求辜顯榮協助。辜顯榮立即招集地區區長一同協助日方，並讓招來的地方壯丁繫上紅色斜肩帶。沒想到，部分壯丁後來反過來對抗日軍，辜顯榮因此背負了叛變之嫌疑。這事後來經過澄清，辜顯榮表明：「我夙浴國家之恩，誓言忠貞不二。」此後他剪掉了辮子<sup>23</sup>。

這種「國家」、「民族」概念在辜顯榮的身上出現，比較完整地反映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日本海軍當局知道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將通過台灣，要求台灣總督出動偵查艇。總督府決定命辜顯榮擔此任務。他於是準備了戎

克船十二艘，並留在淡水擔任總指揮。他自謂：「征俄戰役……我國民可謂舉國一致，緊張到極點，台灣雖然遠離戰火的舞台，但是納入日本版圖僅僅十年，民心動輒產生動搖，因此成為當時海內外的焦點。」<sup>24</sup>

日本之旅，是日人向辜顯榮等人展示現代化經驗，也是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提供一種想像。想像一旦落實，將更加強辜顯榮認同日人的統治正當性。不同於過往的在台政權，日人治理台灣乃是伴隨着傳統舊世界與秩序的逐漸瓦解，以及全面現代化過程的開始。藉着台灣現代化與日人統治策略的調整，一種「較為文明、現代性的日本人」vs.「落後、尚待改造的台灣」二元性對照差異於焉產生。

## (二) 台灣的現代化

台灣是在何種行政體系下被統治呢？相對於日本自身的行政傳統，台灣政府本質上是個相當年輕的行政系統，吸引了剛從歐美留學回來的年輕人加入，他們帶着新穎的想法，亟欲實踐最新的理論<sup>25</sup>。日本人接收時的台灣現況如何呢？

若以衛生條件作為現代化指標之一，依據西方記者戴維森的記載，1895年日軍來台期間，遭受人民抵抗而死於戰爭的日本兵人數很少，卻有1,500個日本人因為這時候發生的霍亂而死<sup>26</sup>，可見當時台灣的衛生條件不佳。井出季和太所著的《南進台灣史考》，引用日本衛生隊實地調查記錄：「房屋四周或院子流出不清潔的污水，或各處積水成泥沼，或居民和豬狗雜居……唯市內據說和日人鑿井（劉銘

傳時代)有關的噴水，以鐵管供應飲水，但桶器極為不潔，好像他們的頭腦和眼裏對不潔毫無認識。」<sup>27</sup>

教育方面，日人來台之前，在台灣受教育的僅限於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教學內容與清朝教育內容一樣，就是漢字、古文的學習。在戴維森的眼裏，在這種教育下讀書多年的學生，仍是相當無知<sup>28</sup>。當時移居台灣的中國移民大部分是勞動階級和原為勞動階級的商人，他們每日為求溫飽，沒有時間求知。商人雖會看書寫字，但僅限於簿記或商業書信的讀寫。多數男子目不識丁，遑論女性。

交通方面，島內雖有鐵路自基隆到新竹間的超窄軌鐵路62英哩，道路有銜接村莊的村級道路，但市鎮連絡之間連一條縣級道路也沒有。中部士紳傅錫祺描述1895年的交通情況，他住豐原潭子，朋友住台中的樹子腳，相距雖然僅十餘台里，但是由於交通不便，竟然很少往來<sup>29</sup>。

日本接管台灣後，1905年台灣已有兩家自來水廠，到了1934年，自來水廠增加到83家，供水人口達百萬餘人。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推動下，下水道工程、郵政、電訊、航運、港灣、鐵路、公路等建設都在不斷擴充。縱貫鐵路在1899年動工，1908年從北到南的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台灣財政在1904年已經可以自主，無須倚靠日本的中央補貼。

日人來台之初，政府在台灣辦的學校有六種：師範學校、國語學校、台灣語學校、小學校、中學校，以及專門學校。此外，還有公學校分布於全島。教學內容有講讀、書寫、地理、算數、歷史及日文。初等教育日

趨普及，辜顯榮過世之前，台灣公學校及齡兒童入學率達到46.69%<sup>30</sup>。

這個由日本統治下的現代化結果，對於辜顯榮的認同，有何影響呢？辜顯榮相當認同日本的統治，評判的基礎是台灣發展前後的對照，同時，還有一個參照對象——中國。大約在1925年，辜顯榮在南部報章刊了一篇文章，談論台灣的政治概況。他時常將台灣與中華民國的發展進行比較，他指出，即使中國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之後，動亂依舊，雖有共和國政治之名，實際上卻是轄區軍閥各自為政，為爭權奪力，強收租稅，把負擔轉嫁給人民，還不斷開啟戰端。他說<sup>31</sup>：

在此軍閥割據之下，國家無法獲得和平與統一，社會也無法獲得安寧與幸福。此即是中華民國的現狀。與此相比，我台灣如何？全島土匪一舉掃清之後，已二十餘年，戰亂一次都沒發生。全島一片祥和之昇平景象，而且台灣人不用服兵役。如此幸福之民，全世界何處尋找？吾人觀察台灣的經濟，前清時代，本島歲入僅數百萬圓，今日則達一億圓以上。稻米與砂糖不用說，單單芭蕉一年的收入即達數百萬圓。……簡言之，台灣現在的經濟，比前清時代增加數十百倍。其具體證據，即是台灣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然此生活水準的提高，其原因，在於二十餘年來之和平，以及產業政策得宜所致。

台灣的現代化與中國的紛亂停滯，愈來愈將辜顯榮的認同光譜推向日本這一端。

辜顯榮相當認同日本的統治，評判的基礎是台灣發展前後的對照，同時，還有一個參照對象——中國。台灣的現代化與中國的紛亂停滯，愈來愈將辜顯榮的認同光譜推向日本這一端。

### 三 殖民策略與認同矛盾

1898年，辜顯榮被命為台灣總督府事務總顧問，同時是台中知事的顧問。當時新竹的庶務課長為蒙古王佐佐木安五郎。他們兩人曾經因為理台政策，彼此有所爭議，甚至發生衝突，佐佐木抽出武士刀來說：「吾乃日本人也。」辜顯榮並不退縮，積極回應：「如果你是日本人，則我是準日本人。準通純。我也是日本人。」<sup>②</sup>原本是政策理念的爭辯，結果變成是日本人／準日本人的區分，以此終止衝突。辜顯榮語「我是準日本人」，反映的不是主體自身，而是怎樣的社會機制與情境，竟然發展出如此的範疇來描述自己？

日本作為帝國的後進者，拿到第一個殖民地，究竟該採用何種殖民策略？與西方帝國面對的非西方殖民地不同，日本面對的是同屬亞洲的殖民地。英國殖民統治與制度創造出自治體的系統 (dominion system)，對於殖民屬地的控制，比較傾向於聯合 (association) 政策。對照英國強調的自治體，日本採用法國的殖民策略，希望將殖民地的子民轉化為同胞，是一種同化 (assimilation) 政策。中央政府對殖民政府的行政具有無容置疑的權威<sup>③</sup>，殖民地乃基於戰略甚於經濟價值的需要才產生。

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一年間，一共歷經十九個總督。一般文獻將統治期間劃分為三個時代：第一任的樺山資紀到第七任的明石元二郎是前期武官總督時代，以鎮壓台灣人的武力抵抗為任務，同時奠定開發台灣的基礎；第八任的田健治郎到第十六任的中川健藏是文官總督時代，一方面需

應付抗議差別待遇而形成的台灣人政治運動，另一方面則配合日本國內的政黨政治需要；第十七任的小林躋造到第十九任的安藤利吉是後期武官總督時代，為因應中日戰爭擴展為太平洋戰爭的需要，把台灣當作南方作戰基地。若從殖民政策的演進來看，則分屬為漸進、同化與皇民化時期。

每一段統治時期都參與着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形塑。台歸日統治約二十餘年，屬文官統治時期。1920至30年是日本大正時代，各類思想最為活躍。當時知識界關心的核心議題，圍繞在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民族自決帝國主義侵略、猶太和共產主義等問題<sup>④</sup>，兩千多名留學日本的台灣年輕人自然深受這些思潮的衝擊。除此之外，神道、與日本同化、殖民地文化、天皇制等都成為這些知識份子彼此辯論探討的課題。

可是，這些台灣年輕人發現在日本所擁有的自由，竟然在自己的故鄉無法享受；可以在日本自由討論分享的書籍，在回台灣的船途中隨時會被沒收。1920年，為了啟發台灣人民的智識，他們於是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發行雜誌，稱為《台灣青年》；協會旨在尋求政治認同與社會平等，帝國的接納與平等，拒絕全然同化的舊觀念，希望能夠保留獨特的台灣文化、設立地方議會，以及選舉代表參與在東京舉行的貴族議會。辜顯榮曾向協會的雜誌社捐贈一次創設資金，金額為3,000圓，這筆數目是捐款中最多的。

這個文化協會，很快地成為政治運動的一環，已經是台灣人反官方、反政府各種運動的大本營。1923年辜顯榮在總督府授意下，組織公益會，

辜顯榮捐款台灣文化協會在前，而後或是出於自願或是在政府壓力下而組織公益會，反過來對抗文化協會。如果我們以為他兩面討好，那可能忽略了各種思潮、日本統治理念的變遷與「認同形塑」的相關複雜性。

對文化協會的反日政治運動加以反擊。涂照彥因此認為，辜顯榮一面親自擔任公益會的會長，一面捐錢給作為民族運動的協會雜誌社，也對東京的台灣青年會進行資助，這是一種民族資本的兩面性與買辦性，與東南亞的華僑資本相似，一方面與當地政府勾結，另一方面又保持作為華僑獨特性格的特點<sup>⑥</sup>。

筆者認為，如果只是這樣看辜顯榮，以為他兩面討好，那可能忽略了各種思潮、日本統治理念的變遷與「認同形塑」的相關複雜性。辜顯榮捐款台灣文化協會在前，而後或是出於自願或是在政府壓力下而組織公益會，反過來對抗文化協會。在日本同化政策帶來的衝突與緊張下，追求台灣獨特性，事實上成為辜顯榮與台灣文化協會一致的目標。

大正年間，總督府計劃廢除全台灣的書房，辜顯榮出面反對，他要求當局慎重行事<sup>⑦</sup>。這表示，他在政治、國家方面認同日本，並不同於對地方傳統、文化，甚至生活習慣的捨棄。從幾件事可以看出，辜顯榮認為身為日本人與保留地方性並不衝突。台北孔廟於1906年曾因為日本都市計劃而被撤廢，1917年，台北的詩人團體瀛社及大正協會會員組織了崇聖會，1925年，由崇聖會會員陳培根展開游說工作，木村匡、辜顯榮、連雅堂三人上台演講，說明孔廟興建與相關事宜，並推舉辜顯榮為議長。他不僅率先捐款，還將強調孔子思想在東方重要性的大綱印刷給兒童。更早之前，1919年，他買下日人經營的淡水舞台，改名為台灣新舞台，專門請上海班、京班、福州班的戲班子來演戲。

辜顯榮在作為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能否取得平衡？而這種緊張性，其實是與日本的統治策略演繹緊扣在一起的。辜顯榮試圖尋找認同的平衡——在日本化的同時，無須廢除地方文化。他認為實施日本愛國教育、現代化教育是必要的，但無須為此強求台灣人的生活習俗全都要向日本人看齊。他以為，如果「同化」一詞指台灣的中國民族同化為日本人，那他認為此同化作用正在進行，島民的教育也朝此方向實現。他續以衣、食、住為例說明這些方面同化的困難。日本人屈膝坐於榻榻米，台灣人坐在椅子上；日人之服裝為寬袖，不穿褲裙，反之台灣為窄袖，有衣也有裳。為了同化台灣人為日本人，這類的改變不僅沒必要，社會儀式與宗教信仰的差異，對於成為日本人也不是阻礙。他指出，真正需要同化的部分是，國語(日語)之普及、忠君愛國之觀念，以及日台人間之通婚<sup>⑧</sup>。

辜顯榮在1918年之前就娶了日本妻子，為何日本卻遲至1933年才通過「內台通婚法」？即使屬特權階級的辜顯榮，對於同為日本人的身份卻遭受差別待遇不免感到困惑。他察覺到日本人身為公民的政治、社會與經濟權利是受到保障的，而台灣人身為公民的權利卻遭到否認。例如教育制度的差別待遇，日本人專唸的小學校與台灣人讀的公學校，在師資、教材內容方面都不同。一直到大正十年(1921)，受到台灣人的激烈反對之後，才出現「內台共通法」，允許日本人唸的小學校招收兩至三名台灣人，他的兒子辜振甫就是在那樣的背景下從台北太平公學校轉至樺山小學校。也是在這種教育不平等的待遇下，1903年台灣中

辜顯榮認為台灣公民之所以「暫時」無法跟日本人一樣，乃是因為台灣自身能力的關係。日本人成功地將此責任轉嫁到台灣人身上，對於平等權利的實踐總可以因為「不夠日本人」而不斷延遲。

部的幾個士紳為了籌辦台籍孩子的中等學校，四處奔走籌款，募集了大約二十四萬餘圓，辜顯榮是創立委員之一，一人捐款了三萬餘圓，於1905年終於成立第一所培育台灣青年的中等學校。

辜顯榮試圖理解這個矛盾，引用孔子的思想指出，日本對台灣的統治，雖有差別待遇，但乃是為了循序漸進<sup>⑧</sup>，台灣與日本不同，以台灣人當時的民智程度，需要一段時間追趕。當有那麼一天，實施「內台共通法」，台灣人與日本人都將在同一法律下，被一視同仁看待。顯然地，他認為台灣公民之所以「暫時」無法跟日本人一樣，乃是因為台灣自身能力的關係。日本人成功地將此責任轉嫁到台灣人身上，對於平等權利的實踐總可以因為「不夠日本人」而不斷延遲<sup>⑨</sup>。

辜顯榮的納悶也反映在關於地方自治實施方面。他指出，由於同化教育的結果，人民程度向上，台灣不乏俊秀之士，然而政府體系內的重要位置沒有一個由台灣人充任。他說<sup>⑩</sup>：

我衷心期望將之改為民選。……既然設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其議員應該改為民選。本來，從前是考慮到本島的文化及人民的程度，所以才暫時採用官派議員制度，將來，我期待而且確信民選時代即將到來。當局提倡同化教育，卻不採用人才，徒造成本島人憂心忡忡。我確信當局將會廢棄此政策，另一方面我也期待本島人民奮發向上。於此，我期望台灣政治革新的方向是，為三百六十萬本島民眾敞開民意暢達之路。我認為，為政者應該體察民意時勢之變化，並將之引導

致有利之方向。這是不可等閒視之的問題。

在保持台灣的獨特性以及要求提高自治程度方面，其實辜顯榮與台灣文化協會的目的是一致的。周婉窈探討過皇民化運動、台灣人改名的狀況，指出有家族因為漢民族意識的主體性堅拒改姓名運動<sup>⑪</sup>。而辜振甫時任總督府評議員，參與多次會議，也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的各種相關政策<sup>⑫</sup>，周婉窈形容辜振甫如其父，是日本統治當局的配合者。但是在可見的文件內，沒有任何辜振甫改名的記錄。以一個跟日本有如此密切關係的家族，卻沒有配合當局的改名計劃，這是令人驚訝的。周婉窈只能猜測，也許這涉及家族榮耀，辜家藉此表示他們家族也有其原則<sup>⑬</sup>。

1937年開始皇民化運動時，辜顯榮於當年去世，我們不清楚，面對這波改姓名的壓力，他將如何應對？對辜顯榮而言，保留台灣文化獨特性與國家認同之間並沒有衝突。但是，他始終未能明白衝突的產生來源，台灣的獨特性正是為了日本殖民政府得以拖延平等公民權而存在。

## 四 結語

1934至1935年辜顯榮出訪中華民國，拜會當時財政部長兼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孔問辜是哪裏人，辜回答說是台灣出身，鄭成功時代從福建泉州移居台灣。孔以為辜身為日本貴族院議員，日語想必說得很好。辜回應，口語能力很差，雖然聽力大致可以。接着提到有些台灣人在福建造成

對辜顯榮而言，保留台灣文化獨特性與國家認同之間並沒有衝突。但是，他始終未能明白衝突的產生來源，台灣的獨特性正是為了日本殖民政府得以拖延平等公民權而存在。

社會秩序的問題，因此孔表示：「台灣人的祖先也是中國人，可是經常到中國來騷擾。他們即使不是中國人，也是日本人；即使不是日本人，也是黃種的東方人。同樣是東方人，卻互相騷擾是不好的。」<sup>④④</sup>此處，「即使不是中國人，也是日本人」是從法理角度來看國家與政治認同。但是隨即又說「不是日本人，也是黃種的東方人」，則返回到種族血緣因素來處理台灣人的身份問題，並以此邏輯來解決社會互動的緊張與衝突。這種看待台灣人身份認同的方式，隱藏着日後國民黨接收台灣時的矛盾與衝突。台灣人從攻打國國民的身份變成原先敵國戰勝國國民的尷尬身份，既無法取信於日本人，也無法得到中國的信任<sup>④⑤</sup>。

我們一路跟着辜顯榮的生平，看見他的身份認同，受到日本與亞洲包括中國的關係、台灣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殖民策略轉變的影響，可見種種複雜因素衝擊着一個人怎麼看待自己。政治與身份認同上，他是個日本人，卻不是出於他個人主動的選擇；他只是忠於歷史的命運安排，彷彿是一種契約概念，條約上的台灣隸屬於日本，他自然得效忠於這個後來的養父。故國的紛亂、日本現代化在台灣的经验，強化了他的這個身份認同。文化與生活方面，中國與台灣的生活習俗，在他來看，無須與日本人同化，因此他可以是日本人也是台灣人。

1937年，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展開對中國的軍事侵略，在中國，是八年抗戰的開始。臥在病牀上的辜顯榮得知南京淪陷，留下淚來。同年，辜顯榮過世。1937年開始至1945年，在台灣是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進行的

八年，此八年不同於前四十餘年的統治，殖民地政府試圖改造台灣人為日本人<sup>④⑥</sup>。辜顯榮的兒子辜振甫，正捲入這場鋪天蓋地的、前所未有的愛國教育運動當中。

### 註釋

①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委員會著，楊永良譯：《辜顯榮傳》（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7），頁334。原書為日文，出版於昭和十四年（1939），由尾崎秀真編輯，以宮崎健三為主筆，資料收集均有專人自台灣與東京分別負責。由於辜顯榮本人不識日文，多賴秘書居中翻譯，反而留下許多書信與資料，成為該傳記撰寫的基礎。下引簡稱《辜傳》。

② 靜思：《辜顯榮傳奇，1866-1937》（台北：前衛出版社，1999）。

③ 《辜傳》，頁350-58、545、595、580-81。黑體為筆者自加。

④ 《台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37年12月14日，第7版。

⑤ 這種討論身份認同的角度，乃受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人文，2006）一書啟發。荊子馨超越壓迫者／受害者二元化的思考方式，分析在不同時期的殖民策略下，台灣人如何與日本殖民主義抗爭、妥協與合作，認同如何從客觀的對立原則轉變成為一個人主觀的內在掙扎過程。

⑥ 〔戴維森〕(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一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198。戴維森後來成為美國駐台領事。

⑦ 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上冊（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99。

⑧ 陳俊宏編著：《李春生的思想與日本觀感》（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2），頁102中，引自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

在政治與身份認同上，辜顯榮是個日本人，卻不是出於他個人主動性的選擇，他只是忠於歷史的命運安排。故國的紛亂、日本現代化在台灣的经验，強化了他的這個身份認同。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165，記載辜顯榮為雜貨鋪「瑞昌成」號的店主。坊間有些記載，將辜顯榮描述為無所事事的浪人，這點頗堪質疑。從階級的觀點來看，若非同屬一個社會範疇，大概很難進入商人或士紳的圈子，甚至獲得信任，何況是請迎日軍入台。

⑨ 「嘆願書」(たんがんしょ)，請願書之意。

⑩⑪ 《馬關條約》，第二款第二、三條；第二款第二條。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 《辜傳》，頁77-80；533；409；67-68；79；79；415；73、524；507；424-25；438。

⑳ 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以上一座)，以及靖台宮能久親王(一座)，共四神二座。見《辜傳》，頁176。

㉑㉒ George H. Kerr,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4), 122; 119.

㉓ 參見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台北：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頁135-36。

㉔㉕ 陳俊宏編著：《李春生的思想與日本觀感》，頁xi；265。

㉖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6年第28期，頁81-119。

㉗ 陳俊宏編著：《李春生的思想與日本觀感》，頁270，註解142。

㉘ 例如第四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本身留學德國，他開啟台灣現代化建設之端，他聘請來台的新渡戶稻造，則曾留學美國與德國，來台後致力於台灣稻米改良與糖業的發展。

㉙ 戴維森：《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一冊，頁190。

㉚ 轉引自王育德：《台灣》，頁110。

㉛ 〔戴維森〕(James W. Davidson)著，蔡啟恆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二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頁421。

㉜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2005)，頁188。

㉝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南天書局，1939)，頁410。

㉞㉟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頁63-64；159。

㊱ 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432。

㊲ 辜顯榮引孔子論政治：「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管子亦曰：「衣食足，而後知禮儀。」《辜傳》，頁377。

㊳㊴ Wan-yao Chou, "Renaming Oneself a True Japanese: One Aspect of the Kōtōminka Movement, 1940-1945", 載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1993)，頁155-212。

㊵ 辜振甫：〈決戰下の教育への希望〉，《台灣時報》，1943年4月；〈護國挺身隊の體驗〉，《台灣時報》，1944年8月。

㊶ 日本據台時，有台人旅居在廈門、福州，因具有日僑身份，中國政府無法管束，因此有些為非作歹的人，日本政府為了加以管束，成立台灣公會。

㊷ 板橋林家後代林衡道在口述歷史中，提到在福州的生活經驗。六歲之前，並不知道自己是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直到看了五四運動遊行回家後，男傭人指他是日本籍的台灣人。他形容這經驗非常震撼。參見楊明哲記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13。

㊸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1。